

第五章 官方態度與「新女性」形象再造

女性所倡導的「新女性」特質顛覆男權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卻也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女性地位改變動搖了維持幾百年的俄國社會結構之基礎。因此，爲了重新穩固社會秩序，「新女性」形象再造成爲蘇維埃政府的當務之急。

第一節 官方態度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關心女性議題與強調性別平等象徵一個人的開明與進步。政黨爲拉攏女性及革命派知識份子，紛紛將女性議題納入遠程目標，包括社會民主工黨、社會革命黨與立憲民主黨。以社會民主工黨爲前身的布爾什維克黨（Большевик）同樣將兩性平等作爲治國原則。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六年頒佈的法令皆能看出政府爲改善女性地位所做之努力。除了法令改革外，蘇維埃政府延續車爾尼雪夫斯基「新人」概念，以創造全

圖 5-1 1920 年



新社會與全新人類爲目標，即「新蘇維埃人」（New Soviet person）。¹²⁸ 塑造「新蘇維埃人」形象爲二、三〇年代政府最重要之課題。然而，蘇維埃政府仍將女性排除於正常體制之外，革命與戰爭的最大功臣-男性，才是國家主體。男性形象代表堅強、剛硬、進步與力量，體現共產社會工人的理想。他們有能力、識字、認真、實現革命承諾與建立共產社會之未來。不論是海報、雕像、郵票或錢幣都以男性形象爲主角，強壯的男性形象不僅象徵「新蘇維埃人」源源不絕的力量，同時代表蘇維埃社會整體之形象。（圖 5-1）

¹²⁸ Engel, Barbara Alpern. *Creating the new Soviet women.//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4, p. 150.

儘管政府承諾兩性平等，女性長期教育水平低落，專業知識與技能不如男性；不論就業率或是任官職比例，女性都比男性低得多。女工失業情形上一章已提過，不再贅述。一九一七至二三年為女性擔任官職的高峰期，包括柯隆泰、阿爾曼德、克魯普斯卡婭等人都曾在政府機構擔任重要職務。二三年後，幾乎沒有任何女性負責政府要職。政府仍舊將女性視為落後之象徵。女人並非國家運轉之主軸，唯有蘇維埃政府欲強調兩性平等或有其他政治目的時，女性才會浮出檯面。然而，社會主義女性卻深信政府絕對會實現兩性平等之諾言。二〇年代，女性為了擺脫傳統女性特質束縛，創造全新的價值觀與道德觀，衝擊整個俄國社會。她們相信女性可以如男性般自由，傳統的家庭與婚姻體制再也無法約束她們。

相對於「新女性」與共青團思想之開放，政府官員對婚姻、家庭及性愛的看法顯然保守許多。正如中國人所云：「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乃治國之根本。任何家庭制度的變遷都會動搖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度。因此，當權者必須先穩固家庭組織，接著才能治理國家，甚至平定天下。列寧重視家庭的原因便在於此。不一味摧毀所有傳統制度為列寧與其他激進份子間最大的差異。他不僅不廢除婚姻與家庭制度，還肯定婚姻、家庭與愛情三者間的關連與重要性。列寧認為「愛情無法存在於資本主義婚姻之中，而充滿愛的無產階級婚姻卻是理想的家庭制度。」¹²⁹ 為了讓愛與婚姻同時存在，離婚法乃是必要手段。對列寧而言，離婚是為了延續另一份愛與婚姻。換言之，愛情、婚姻與性密不可分，列寧無法接受薩寧主義者與杯水主義者性愛分離概念。當共青團成員指責政府保留婚姻制度，違反馬克思主義精髓時，列寧反駁「杯水主義才是百分之百的反馬克思主義。口渴當然必須解渴，但正常人在正常的環境下會喝排水溝裡的水解渴嗎？然而，社會觀點才是最重要的。喝水是個人之事，愛情卻關係到兩個人，甚至三個人，這將會形成全新的生活形態。這種新型態牽涉到社會利益，因此必須對共產社會負責」。¹³⁰ 也就是說，列寧認為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都會牽動社會秩序，關係國家利益。因此，他將原屬於私人領域的婚姻、家庭與性愛關係納入國家公共事務之內，

¹²⁹ Shlapentakh, Vladimir. *Love, Marriage and Friendship in the Soviet Union: ideal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84, p. 20.

¹³⁰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8, p. 377.

政府便有權介入人民的私人生活。列寧鼓勵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將精力轉移至其他地方：「年輕人特別需要享受歡愉與揮灑生命力。健康的運動、游泳、跑步、散步等各種肉體運動，還有多方面的智力遊戲都是很好的抒解方式」。¹³¹ 列寧反對性放縱與鼓勵精力轉移的概念，在未來幾年逐漸成爲蘇維埃政府的主要方針。

一九二六年，蘇聯心理學家札奧金德(Арон Борисович Залкинд, 1886-1936)提出禁慾說，以修正當時社會性放縱風氣。他強調共產社會的集體概念，個人慾望與情感都應加以節制。札奧金德要求人民將性衝動轉換成工作熱忱，所有行動與念頭都必須以黨利益爲前提。他提出「無產階級之十二戒」(двенадцать заповедей поло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包括禁止婚前性行爲、嚴禁無產階級份子抱持純肉體的性慾望、夫妻間太過頻繁或是反常之性行爲同樣不被允許，更重要的是他認爲階級利益有權干預個人性生活等規定。¹³² 性慾不能妨礙共產社會之穩定，所有妨礙集體革命，造成社會混亂的個人行爲都應受規範。蘇聯著名作家與評論家盧納察爾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則是在這幾年再三強調一夫一妻制之重要性。他認爲「持久的兩人夫妻制度乃是社會唯一正確的家庭形式，這種能夠維持普通生活與生養小孩的組織才是我們需要的社會制度。所有欲盡政治、勞動與人類義務的人民都應建立此種家庭組織」。¹³³ 由於棄嬰現象氾濫，政府無力照顧安置現有孤兒。盧納察爾斯基主張在棄嬰問題解決前，人民必須禁慾，降低新生兒出生率。在政府與保守派官員倡導下，禁慾主義逐漸取代性解放思潮，成爲三〇年代蘇聯社會的主流文化。

史達林承襲列寧對家庭觀的看法。史達林認爲穩定的家庭結構可減弱人民的反抗傾向，它驅使人民尋求更優渥的物質享受，因此更依賴國家。除此之外，固定成員的家庭結構可彼此監視，防範任何反抗意識之產生。家族有責任讓所有成員遠離反抗活動，即所謂監視功能。由於家庭的監視功效大於任何秘密警察組織，因此，穩固家庭結構乃統治者最重要的任務。

¹³¹ Stites, *op. cit.*, p. 378.

¹³² *Ibid.*, p. 381.

¹³³ *Ibid.*, p. 382-383.

況且穩定的家庭才能培養思想健康的下一代。家庭為兒童教育中重要的一環。除了學校教育，家庭對兒童影響力也很大。青少年離開學校後，重塑思想過程被迫暫停。為了徹底改造下一代的思想觀念，家庭必須持續對兒童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家庭在蘇聯時期非但未被摧毀，甚至更加穩定。列寧由於肯定愛情而贊成離婚，史達林卻認為真正的愛情必須持續一輩子，離婚與背叛都是不被允許的，永恆的愛情等同永遠的婚姻，如此的愛情婚姻才是理想的無產階級婚姻。政府以長久穩定的婚姻意象取代實際婚姻，一九三六年的法令不僅加強離婚困難度，還禁止墮胎。¹³⁴ 性別平等議題完全從政府政策抹去，因為史達林認為共產社會中男女完全平等，性別議題沒有存在必要，也不需有女性運動。因為所有女性都必須是蘇聯「新女性」。

一九二〇年代，女性定義的「新女性」特質與政府預料的截然不同，社會主義女性期望政府解除女性枷鎖，將婚姻、家庭與性愛等私人領域之事變成社會責任。然而，性革命與反婚姻聲浪動搖社會結構，要求國家擔起育兒工作更讓政府困擾不已。「新女性」概念不僅造成社會混亂，還帶有反抗與改革意識。為了改變社會風氣與穩定政權，蘇聯政府決定重新塑造「新女性」形象與特質。共產社會確實重視女性生產力，以男性為主體的蘇維埃政府卻更重視婦女的母性與家庭性。政府一方面鼓勵女性投入生產行列，一方面強調女性養育小孩、縫紉、烹煮的傑出能力與天性。他們肯定女性有權出外工作，卻要求女性同時擔起育兒及打掃等家庭責任。婚姻與家庭結構再度束縛女性，將自己奉獻給國家建設的女性並非蘇聯「新女性」。女人必須先扮演好母親與妻子角色，才有資格走出家庭。女性的家庭功能勝過社會功能。女工形象僅是為了象徵性別平等而存在，女性實際生活情況卻和傳統男權社會相差無幾，甚至為了扮演雙重角色而負擔更大。

第二節 蘇聯官方「新女性」再造

為了轉變一九二〇年代性放縱的社會風氣與女性卸下家庭責任的傾向，蘇維埃政府必須營造新的社會風氣，改變當時女性提倡的「新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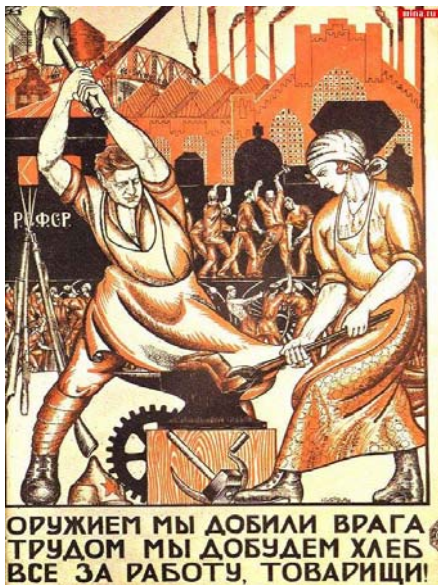
¹³⁴ Shlapentakh, Vladimir. op. cit., p. 27.

文化。善用大眾傳媒與醫療專家說法為蘇維埃政府能迅速轉變社會風氣、人民的道德觀念與重塑蘇聯「新女性」特質之最主要原因。

壹、大眾傳媒

媒體為影響社會意識最迅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不論海報、電

圖 5-2 1920 年



影或小說皆可在短時間內影響成千上萬的讀者或觀眾。然而，儘管婦女部努力改善女性文盲現象，俄國女性識字率至一九二二年仍僅達百分之四十二，城市以外之地區比例更低。由於女性教育素養不高，小說影響力大幅降低。海報(Советская Плаката)與電影對中下階層份子灌輸意識型態之功效遠大於小說作品。不論是歌頌共產主義、批評資本社會、創造「新蘇維埃人」典型，或是蘇聯「新女性」形象皆能透過宣傳海報傳達給人民。藉由以女性為主體的海報將可瞭解蘇維埃政府讚揚的「新女

性」典型與特質。海報影響中下階級女性，文學作品則對受過教育的社會主義女性影響較大。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不僅刻畫出新人的理想社會，為人民創作一個「模範」(model)的概念成為蘇聯文學之新趨勢。¹³⁵ 官方規定所有作家都必須依此方針，進行創作。從二、三〇年代的女性海報與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將蘇聯「新女性」分為女性社會功能、母性、家庭性三大特質。

圖 5-3 1926 年



¹³⁵ Rosenshield, Gary. Afterword: The Problems of Gender Criticism; or, What Is to Be Done About Dostoevsky.// A Plot of Her Ow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95, p. 116.

一、社會功能

積極參與政治、經濟與社會工作之女性形象乃是蘇維埃「新女性」的典型特徵。肯定女性生產力在三〇年代隨處可見，其中最著名的作品為卡寇巫特(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гоут, 1891-1959)於一九二〇年創作之海報。(如上頁圖 5-2)。海報中穿著圍裙及綁著紅頭巾工作的年輕女性證明女人也為國家建設付出一己之力。海報中女主角的堅毅眼神、強悍姿勢與認真態度打破傳統女性柔弱意象。¹³⁶幾百年來都被邊緣化的女性，最渴望男性肯定其社會生產力，而不僅是繁衍後代的能力。此海報的紅頭巾和圍裙更成為蘇維埃政府延續幾十年的蘇聯「新女性」形象。上頁圖 5-3 的海報引用列寧的話：「每一位廚娘都必須學會管理政府。」暗示每一位女性都有機會參與政治。圖 5-5 則是以女士兵的形象，肯定女性戰場上的貢獻與能力。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9-1953)則比列寧更重視女性生產力。對史達林而言，公眾事務與國家利益才是政府關心之焦點。女性僅是機械式集體生產中的一員。他只在乎女性能為國家帶來多少貢獻，而不是她扮演什麼角色。因此，很多蘇聯海報皆以工廠或農場的集體女性為主體，強調一大群女性共同投入集體生產行列（如圖 5-4）。

圖 5-4 1930 年



代的「新女性」太重視婚姻、家庭與性愛等私人領域議題，這些海報鼓勵女性從私人走入公共領域，將她們的焦點從兩性相處轉移至國家建設。這些將國家未來寄託在女性身上的海報不僅安撫質疑政府政策的社會主義女性，更使她們以國家利益為第一考量，降低私人領域之重要性。

除海報之外，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同樣值得注意。奧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1935)中男主角保爾(Павел Корчагин)的老婆達雅(Тая Кюцам)便是女性參

¹³⁶ Waters, Elizabeth. *Female form in Soviet political iconography.*// *Russia's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234.

與政治與社會工作的榜樣。達雅嫁給保爾前原是做粗活的工人，她不懂政治也不會參與共產黨的活動。但保爾承諾要帶領她使其成爲真正的人。婚後，達雅在保爾的指導下漸漸地從地方婦女部代表晉升爲市蘇維埃委員。保爾高興地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

前幾天，達雅得意地把她第一次當選爲婦女部代表的證件給我看。這證件對於她，不僅僅是一塊普通的硬紙。從這我正看到一個新人的誕生，我將盡我的力量幫助她。終有一天，一個大的工廠，一個工人的集體，會使這個新人完全成熟。我們住在這裡的時候，她只有沿著這樣一條唯一可以行得通的道路前進。¹³⁷

之後，達雅專心致力於婦女部的工作，無法兼顧家庭與照顧保爾。保爾卻絲毫不介意妻子每天忙到深夜才回家。

過去，曾經有一段時候，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那時候對他有更多的溫存和照顧。可是那時候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現在她卻是他的學生和黨內的同志。他明白，她政治上越成熟，她能照顧他的時間就越少。他坦然地接受這必然的結果。¹³⁸

相對於活躍在婦女部的達雅，拉夫列尼約夫(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Лавренев, 1891-1959)《第四十一》(Сорок первый, 1924)中的瑪柳特卡(Марютка)則是軍事上的「新女性」典型。瑪柳特卡原本爲漁村小孩，卻在十九歲那年決定加入紅衛軍。

開始招收志願紅衛隊員時，瑪柳特卡猛然把刀往剖魚凳上一扎，穿著硬梆梆的油布褲子，來到赤紅隊報名。一開始人家把她攆走了。後來她天天纏著人家不放，大家都笑她。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則，她最終被紅衛隊接納了。但還是讓她寫了保證，不准普通婦女一樣生

¹³⁷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431。

¹³⁸ 同上註，頁439。

活，在勞動人民最終打敗資本家之前，不能要孩子。¹³⁹

圖 5-5 1926 年



瑪特柳卡加入紅衛軍之後，成為隊上最出色的射擊人員。有一次，瑪特柳卡在押送白軍犯人時，不幸遇風災，困在孤島之上。三天相處讓瑪柳特卡愛上白軍犯人。但瑪柳特卡卻在白軍救援船到達時，毅然決然地殺了她的愛人，犧牲愛情完成任務。瑪柳特卡的女射擊兵形象更成一九四〇年代「新女性」典型。蘇聯巴什基爾作家梅更(Кирей Мэргэн, 1912-1984)短篇小說〈季菲姐〉(Зифа апай)中的女主角季菲(Зифа)也是位工作能力不輸男性的「新女性」，雖然她「無論從個頭看，無論從她

的力氣看，還是從她耿直敦厚的性格看，她都像男子」。¹⁴⁰ 但「她出眾的勤勞與堅強的個性，村裡的人個個佩服。有這麼多人想娶她作老婆」。¹⁴¹ 這些女性都是典型的蘇聯「新女性」，她們不靠外表，反而以純樸、認真的個性與卓越的社會能力吸引男性。

二、 母親

儘管女性亟欲擺脫母親形象與育子責任，延續數百年之久的蘿彰妮欽(Рожаницы)與聖母意象卻深植男性心中。聖母撫慰人心、庇護人民的形象為男性心中理想女性之典型。社會期待女性擁有母親般溫柔、堅強與寬容等特質。除此之外，佛洛依德認為母親與兒子間的特殊情感對個人認知發展有密切關係，即所謂

圖 5-6 1930 年



¹³⁹ 拉夫列尼約夫。《第四十一》。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5，頁 3。

¹⁴⁰ 基·梅更。〈季菲姐〉//《蘇聯短篇小說大系》，台北：萬象，1992，頁 231。

¹⁴¹ 同上註，頁 238。

「伊底帕斯情節」。當社會主義女性提出國家育兒所概念時，不少男性以佛洛伊德理論強調母親角色之重要，他們認為母親影響小孩的人格發展，缺乏母愛會造成小孩人格上的缺陷。母親不僅是養育者，她們帶給小孩的溫暖與安全感是國家無法給予的。

對政府而言，母親為穩定社會之重要角色。二〇年代的實際婚姻與棄嬰造成社會混亂，女性拋棄母親角色對男性及政府而言都是極大的困擾。男性不滿女性推卸責任，重視生產力的蘇維埃政府則是認為女性養育小孩為最簡單、有效的管理方式。加上三〇年代低出生率，造成人口危機，政府更深覺母親角色之重要。因此，創造新的「蘇維埃母親」(Soviet mother)形象便成為「保護母性與嬰兒部門」(Depart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hood and infancy)首要任務。¹⁴² 一九二五年左右，抱著小孩的母親海報大量出現在蘇聯境內（如圖 5-5, 5-6）。政府期望女性發揮所長，養育出健康的下一代共產成員。強調女性最大的社會功能，即是培育思想健康的無產階級成員。蘇聯當時街道上的孤兒景象與母親海報呈現強烈對比。

圖 5-7



嬰兒高死亡率突顯出女性母親角色的重要與正確性。為了讓女性重拾母親角色，政府把養育小孩與女性意象結合，強調生養小孩不僅是女人的天性，更是女性的社會責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海報大多缺少男性。暗示育兒僅是女人之責任，男性無須負責的概念。¹⁴³ 除海報之外，高爾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的《母親》(Мать, 1906)為「蘇維埃母親」形象的原型。小說中的母親受兒子影響，走上革命份子之路。她不僅是男主角巴維爾(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ласов)的母親，還是全體革命份子的母親，從頭到尾關懷、守護著大家。

在母親眼中，兒子的身影和他命運相同的人們漸漸融合在一起，不

¹⁴² Waters, Elizabeth. op. cit., p. 236.

¹⁴³ Ibid.

斷變大，引起她許多遐想；使她對巴維爾的思念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地得到擴大，向各個方面展開。這種思念像一道道纖細的、強弱不同的光，射向四面八方，照到所有的角落，力圖照亮一切，把一切匯集到一個畫面，不讓她的思想停留在一件事上，不讓她老是一心懷念兒子，為兒子擔憂。¹⁴⁴

高爾基的母親形象在三〇年代再度受到重視，願為兒子犧牲一切，改變自己的蘇維埃母親成為蘇聯「新女性」的主要特質。皮利尼亞克(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Пильняк, 1894-1938)短篇小說〈一個人的誕生〉(Ро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1930)也是一部強調母親神聖性之作品。故事中的女主角安東諾娃由於情人要求她墮胎而離開他，獨自到療養院待產。她認為

他侮辱了一個尚未出生的人，而這個人的父親恰恰是他自己，而他自己的是由母親生下來的！.....聖潔，聖物這類詞已經老掉牙了，但我想不出別的字眼了，並不是因為這是我的身體，我才感到它是聖潔的，而是因為在我的身體裡成長著一個人。¹⁴⁵

皮利尼亞克再三強調母親懷孕生產的偉大，以及母親與小孩的不可分離性。當安東諾娃聽到小孩呱呱落地的哭聲時，血緣相連的感動衝擊著她。

我聽到一聲哭叫，這聲音是連貫和健康的，我看到了一個紅紅的、有皺紋的小生命。他還和我連在一起，帶著我身上的血斑。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他從本來不是人的物質變成了一個人，一個在我童年日記中無法找到、現在卻具體感受到的人.....是我的.....一個人！〈...〉這時，分娩的偉大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也許我早已有這種感覺了。¹⁴⁶

相對於二〇年代墮胎與避孕之普遍，三〇年代的文學作品與海報皆不斷強調女性繁衍後代之重要與偉大。諷刺的是，蘇維埃政府亟欲抹去傳統

¹⁴⁴ 高爾基。《母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242。

¹⁴⁵ 皮利尼亞克，〈一個人的誕生〉//《蘇聯愛情小說》。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107。

¹⁴⁶ 同上註，頁121。

文化的痕跡，這些母親海報卻將蘇維埃母親與聖母意象連在一起。如同東正教以聖母形象影響取代原始女神意象，蘇維埃政府以蘇維埃母親形象取代聖母，女性仍脫離不了母親角色的束縛。

三、家庭性

除母性外，家庭性同樣是婦女長久以來的枷鎖與束縛。爲了專心致力於工作，女性提出育兒所與公共廚房的概念。女性拒絕像以前一樣負責家庭事務，煮飯、洗衣、縫紉等，這些家庭雜事侷限女性的視野。然而，大部分男性仍將家務視爲女性應盡之責任。他們允許女性出外工作，但必須先做好打掃、做飯、帶小孩等工作。政府則是口頭上肯定女性生產力，女工失業率卻居高不下。大部分女性負責的工作還是和家庭離不了關係，譬如烹飪、縫紉性質的工作。

¹⁴⁷（如圖 5-7）。蘇維埃政府重視效率與生產成果，將女性天生能力運用在適當之處爲理所當然之現象。儘管政府承諾女性可以在各行各業找到工作，實際情形卻不如女性預期。和男性相比，女性仍舊侷限在家庭與婚姻等私人領域。男性才是集體社會與公共利益的代表，他們負責建設社會主義理想社會。女性僅扮演次要角色，只能默默地支持男性，做好育兒與家務工作，減輕男性負擔。身爲無產階級女工，女性必須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與培養政治意識；身爲母親與妻子，女性卻只能侷限於家庭之中，永遠和社會脫節。雙重身份不僅壓得女性喘不過氣，更造成女性人格上的分裂。¹⁴⁸

蘇維埃政府發行女性海報，不代表支持女性解放，最有力的證明便是一九二一～二四年，這段女性運動最活躍的時期鮮少有女性海報出現，一

圖 5-8 1931 年



¹⁴⁷ Engel, op. cit., p. 152.

¹⁴⁸ Waters, op. cit., p. 242.

九三〇年婦女局關閉後，女性海報卻大量出現。女性海報並非強調性別平等，它僅是爲了宣傳蘇聯「新女性」意識型態而存在。政府對女性角色之期待取決於社會環境，當社會需要女性社會生產力與政治支持時，女性社會角色之重要性便大過家庭。然而，二〇年代末俄國家庭制度混亂，出生率低落，社會動盪不安，女性的母親與妻子角色則又會壓過女性的社會角色。¹⁴⁹ 因此，蘇維埃政府同時把兩種角色加諸於女性身上，蘇聯「新女性」結合傳統繁衍能力與新興的生產能力，但不論是何種角色，蘇聯「新女性」總是以強壯、健康、美麗且無性暗示 (asexual)的形象出現。¹⁵⁰ 爲了重塑性解放時期混亂的女性特質，政府將傳統理想女性特質與無產階級女工意象融合在一起，創造出新的蘇聯「新女性」。

貳、醫療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性意識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1976)中將醫生與心理醫生等專業人士視爲國家影響人民性意識的方法之一。他認爲醫學以緊張失序(nervous disorders)的說法解釋性，心理學則稱性反常爲一種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這兩種專家說法控制社會大眾對性的看法，將性行爲分爲正常與不正常。¹⁵¹ 統治者無庸置疑地能影響國家政治、社會經濟與人民生活形態，但傅柯特別強調性(sexuality)與統治權力間的關係。性原本屬個人隱私，它泛指人們心中的樂趣與幻想，以及身體的使用慾望。然而，當性被醫學化與社會化後，它便進入「知識」、「權力」與「控制」的特別關係中。傅柯認爲「性只是『看來』自然天成，但實際上卻受到『權力』與『知識』左右」。¹⁵² 透過由專家分析解釋的資訊，即稱爲「知識」，專家藉由其權威地位，左右人民對性的看法。一般而言，人民尊重心理學家與醫生，認爲他們乃是研究性與性別的專家。因此，他們發表的言論「原則上」比政府客觀，具科學性。人民無法反駁立場，容易受其影響

¹⁴⁹ Attwood, Lynne and Kelly Catriona. Programmes for identity: The New Man and the New Women.// 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881-1940. New York: Oxford UP. 1998, p. 275.

¹⁵⁰ Ibid., p. 281.

¹⁵¹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 30.

¹⁵² 米歇·傅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1993，頁 62。

與控制。一九三〇年代，蘇維埃政府同樣利用專家說法，修正二〇年代的性放縱風氣。

「新女性」與共青團的性愛觀使性病在俄國急速傳開。爲了根除二〇年代性放縱造成的後遺症，蘇維埃政府藉專家說法加強禁慾的正當性。醫生將性病傳播歸咎於女性。他們聲稱女性是危險的性病傳播者，男性爲無辜的受害者。城市女性象徵疾病與危險，她們威脅所有男性的健康。許多保守派官員重申其反對女性走出家庭之立場，他們主張女性自古以來便帶有危險與墮落的特質。社會女性將會威脅整個社會結構，阻礙共產社會之實現。

除了性病外，避孕跟墮胎同樣與女性息息相關。革命初期，爲了糾正傳統文化的錯誤，緩和女性經濟困境，蘇維埃政府允許墮胎合法化。然而，當共產社會穩定後，墮胎仍被視爲罪惡。共產社會中的女性皆有責任爲國家繁衍後代，墮胎不僅損害母體健康，更使國家損失一名新成員。避孕也是同樣的道理。政府強調生養小孩爲女性天職，任何避免懷孕生子的手段都不應該。醫生聲稱墮胎與避孕皆會造成一連串的疾病與後遺症，增加女性對墮胎的恐懼，以達到政府目的。保守人士認爲不論性病、墮胎與避孕都是性放縱造成的結果。因此，禁慾爲唯一的解決方法。除了透過醫生強調性病、墮胎與避孕的危險外，蘇維埃政府主張無產階級份子應該將精力轉移至社會工作，爲實現共產社會理想而克制所有慾望。政府期望蘇聯「新女性」具有貞潔特質，她們不應與性放縱聯想在一起，無性的母親形象才是完美的「新女性」。不斷將女性的母親與家庭特質神聖化，蘇維埃政府成功改變「新女性」形象，將母親、妻子與無產階級女工三者身份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全新的「新女性」典型。

第二節 男性態度

政府透過大眾傳媒與專家說法固然可以改變民眾價值觀。男性態度對「新女性」的期望也是促成傳統女性特質回籠的原因。一九二〇年代，社會女性以實際行動改變女性傳統地位與形象，她們將工作視爲生活重心，投入公共工作、爲國家建設付出一己之力，女性藉由工作肯定自己的社會

價值。女性不願再侷限於家庭之中。然而，男性卻仍將傳統女性特質加諸於女性身上。丈夫仍要求妻子負責家務，他們「期望女性能準備所有事情的婚姻生活」，甚至表示「一雙乾淨的襪子勝過心靈成長的妻子」。工作能力強的女人帶給男性很大的壓力，如同謝夫林娜(Ли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ейфуллина 1889-1954)〈個人的不幸〉中女主角的丈夫所表示：

和你在一起生活，我覺得很難受，很討厭。你是一個有點過份地我行我素的人。還強求別人這樣那樣！可是紐洛奇卡的要求很有限，無論什麼時候她總覺得很幸福，如果有誰表示羨慕，說她同我倆人一起坐汽車出門了，或者我給她添置了一套衣服，她會慶幸整整一個月。可是對那些像你一樣的偉大的卡捷琳娜女皇們，作丈夫的都還不習慣。¹⁵³

男性喜歡保有傳統特質的女性，他們把打掃、做飯、帶小孩等視為女性優點，工作能力優越的女性無法吸引男性。如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不在意妻子每天忙到深夜的男性屈指可數。因此，蘇聯「新女性」除了以工作證明自己的能力外，必須同時負擔傳統家務。社會賦予女性的雙重負擔與期望讓女性更加疲累。雖然，列寧也曾指責男性不該將家務視為女性之工作，卻沒有提出任何改善方法。¹⁵⁴

社會對「新女性」的角色期待與女性的自我認同之矛盾，讓女性無所適從。社會期待女性能扮演好女工、妻子與母親三重角色，但不同角色所要求的行為標準皆不同，這種差異造成女性心中的矛盾與衝突，即「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¹⁵⁵ 為了消除角色衝突所帶來的焦慮緊張，女性必須改變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透過這一套方式，改變的僅是個人對外環境之詮釋，外在環境與外界期待並未改變。女性必須衡量涉及角色之先後次序以及相對之重要性。換言之，女性必須先衡量何者為較重要之角色。如能決定衝突角色之先後次序，即可以消除角色衝突及其所帶來的焦慮感。

¹⁵³ 孫美玲編，《莫斯科女人》。石家莊市：河北教育，1995，頁 21-22。

¹⁵⁴ Stites, Richard. op. cit. p. 378.

¹⁵⁵ 張華葆，《社會心理學理論》。台北：三民書局，1986，頁 170。

三〇年代的「新女性」爲了消除焦慮感不得不放棄社會工作，回歸傳統家庭角色，經濟困境、社會期待與政府壓力皆不允許女性放棄母親與妻子角色。除了女性特質回歸傳統之外，沙皇時期的眾多法令再度恢復：離婚複雜化、禁止墮胎、不承認之前「新女性」倡導的實際婚姻、嚴禁同性戀等等。蘇維埃政府逐漸建立起自己一套說教式、有束縛性的思想體系，一種新的專制主義結構。以不斷讚美軍事化成就和革命者功績的方式，重新界定兩性之間的相處模式與對待性的態度。政府禁止人民在言談中參雜性內容，竭盡全力抑制、轉移和阻撓年輕人性意識的發展。

社會教育與政府立場影響成年人的想法與態度，兒童教育針對小孩進行思想改造。列寧於一九一八年的教師代表大會上表示「唯有透過學校才能鞏固革命勝利之成果，革命換來的事物將會在下一代身上獲得強化。」克魯普斯卡婭則認爲幼稚園與學校能呈現培育全新蘇維埃人之完整過程，它是整個社會參考的典範。¹⁵⁶ 因此，兒童教育顯得格外重要。每一課的讀本內容、每一本讀物、每一場遊戲、每一首歌，甚至每一個行政程序都是有目的性的，即教育無產階級小孩。使其所思所爲皆符合社會期待，包括服從集體、反抗資本主義與灌輸新的道德價值觀。除家庭以外，學校是第一個讓兒童接觸到異性朋友之場所。兒童能透過男女同學的行爲表現與老師的態度瞭解社會期待的性別特質。蘇維埃政權不止改造「新女性」特質，全新的道德價值觀也透過兒童教育植入下一代的腦海中。

無產階級婚姻、蘇聯「新女性」與禁慾主義成爲學校、少先隊員與共青团的理想。蘇聯一九二〇年代的性革命與女性運動就這麼劃下句點。統治者決定往後幾十年的文化發展，社會價值觀與人民思維模式都必須符合政府期望。蘇維埃政府成爲文化霸權，控制整個蘇聯文化。

¹⁵⁶ Rosenhan, Mollie Schwartz. *Images of Male and Female in Children's Readers.// Women in Rus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77, p. 295.